

女性家政就业中的社区嵌入与协作实践：基于家政企业的案例研究

左丹 商梦同 刘清茸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阶段，农村女性的家政就业逐渐成为地方治理与基层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潜力女”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 5 位家政从业女性的深度访谈与民族志资料，探讨女性如何在地方化平台中实现就业嵌入、社会协作与身份重塑。研究发现，“潜力女”作为企业、社区、政府协同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不仅为女性提供了稳定收入与职业路径，也通过工会、妇联、技能培训等机制，构建出一个具备社区嵌入性与多元协作性的支持体系。女性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由“脱贫对象”向“行动主体”的转变，其就业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与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本文尝试以参与式发展为理论工具，为理解农村女性在地方法性制度安排中的实践能动性提供新视角，并对后脱贫时期的乡村治理与妇女发展提出政策启示。

关键词：家政就业；社区嵌入；协作实践；女性脱贫；地方治理

DOI：10.69979/3029-2700.25.10.046

引言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逐步衔接的背景下，大量“脱贫人口”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服务型就业市场，家政行业成为接纳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在中西部地区，随着地方政府、妇联组织与社会企业协同推动家政培训与妇女就业支持项目，家政行业正在演化为一种兼具市场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基层发展机制^[1]。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农村女性脱贫路径的研究多集中于产业扶贫、非遗传承、技能培训等议题，而对于“家政就业”这一具有明确劳动价值与社会性别特征的领域，系统研究仍显不足。一方面，家政劳动长期处于“非正式经济”与“性别劳动”交叉结构之中，其制度认同、劳动保障与社会地位问题受到广泛争议^[2-5]。另一方面，家政行业中的女性往往通过社区组织、工会机制或企业平台参与劳动协作、职业培训与情感支持，展现出丰富的社会实践路径^[6,6-8]。

本研究以“潜力女”企业为案例，探讨女性家政从业者在地方法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嵌入路径与协作机制。

本研究的问题在于：

（1）家政就业平台如何通过社区机制实现对农村女性的社会嵌入？

（2）在“潜力女”的组织架构中，如何形成多层次协作机制以支持女性的职业发展？

（3）女性如何在“被雇佣”与“参与治理”之间实现身份与能动性的转化？

为回应以上问题，本文结合民族志方法与访谈材料，深入分析女性家政劳动的制度环境、组织机制与实践逻辑。

辑。

1 理论框架

参与式发展理论

最早在中国引入“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学者之一是李小白教授，他的观点是，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通过自身的能力正面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行^[9]。强调发展的焦点应该是人的发展，只有人们真正发展，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10]。参与式发展对多元化、非线性的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作用^[11]。参与式发展的内容和要义应该要改变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角色转化时应该要有同理心，懂得换位思考^[10]。

本研究中，参与式发展理论为探讨家政就业平台与农村女性社会嵌入、组织架构中的协作机制以及女性身份与能动性转化提供了理论框架。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案例选择

本研究聚焦家政企业“潜力女”内部组织架构下的女性劳动者群体。该企业成立于 2017 年，是当地妇联和人社部门重点扶持的代表项目之一，现有员工超千人，涵盖育婴、月嫂、保洁、护工等多个服务类型。公司内设妇联、工会及职业培训中心，并承担政府技能培训任务，组织结构与社区嵌入特征明显。

本研究共访谈了 5 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员工，涵盖管理层、月嫂、保洁员、陪护员等多个岗位层级，包括布依族、侗族、苗族与汉族女性，年龄分布为 25 岁至 5

2 岁之间，均有脱贫经历，部分为异地搬迁户。

2.2 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方式开展数据收集，时间跨度为 2024 年 6 月至 2025 年 3 月。

深度访谈：采取半结构化提纲进行一对一访谈，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1) 家政行业的进入路径与动因；2) 社区与组织的支持机制；3) 协作过程中的困难与成长；4) 家政工作的个人与家庭影响。

参与观察：研究者多次进入“潜力女”家政总部办公区与培训中心，观察日常事务运作、培训组织、员工例会等场景。

文件资料分析：研究还收集了该企业与地方妇联、人社局的合作文件、培训计划、制度章程等内部材料，辅助理解政策嵌入与制度运作。

2.3 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文本与观察笔记进行编码与分析，参考 Braun & Clarke (2006) 提出的六阶段流程：熟悉数据；初步编码；归纳潜在主题；审核主题；命名与界定主题；撰写报告^[12]。编码过程中结合前期构建的分析框架，设定初始编码类目（如：协作机制、社区资源、技能培训等），在实际分析中持续调整与生成子主题。此外，研究采用 NVIVO 辅助进行编码管理，确保分析过程系统、可追溯。

2.4 伦理考量与研究局限

本研究遵循科学研究伦理规范，所有受访者均签署口头或书面知情同意声明，数据处理过程中实施去标识化与匿名化原则。研究重在呈现女性多元主体性与组织经验，避免身份标签化及“弱势”叙事。

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样本集中于“潜力女”单一企业，尽管其具有代表性，但仍需谨慎推广至所有地区与组织类型；其次，研究者身份可能对受访者陈述产生一定“期望回应”效应，已通过反复访谈与多源验证尽量控制偏差。

3 经验呈现与分析

本章以参与式发展理论为分析视角，结合访谈与观察数据，从“社区嵌入”“协作机制”与“能动性”三个维度，对“潜力女”中的女性劳动实践进行剖析。

3.1 社区嵌入：组织资源与地方社会的双重支撑

“潜力女家政”的运作模式高度依赖于社区资源与地方支持体系，其总部与培训中心设立在城区，并与多个异地搬迁社区保持合作关系。多数女性员工本身就是社区居民，呈现出“家岗一体化”特征。

异地搬迁户腊梅花提到：“公司离家就十几分钟，

上班方便，照顾老人孩子也不耽误。”这种“近场就业”模式不仅降低了女性外出务工的成本，也重塑了家庭分工结构，增强了女性在家决策中的参与度。

同时，公司设有妇联与工会系统，为员工提供托育、助学、健康体检等综合服务。如管理人员“茉莉花”所言：“每年孩子考上大学，公司还有生活补贴，这让我们感受到组织就是娘家人。”这类资源整合机制体现了“社区嵌入”制度基础，有效提升了妇女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3.2 协作机制：集体互助与组织信任的形成路径

“潜力女家政”以团队协作为基础运行，强调“师徒带教”“互助小组”“项目对接”制度安排，使女性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形成“成长—支持—回馈”的良性循环。新入职的“杜鹃花”在提到自己从保洁员到项目经理的成长经历时表示：“一开始啥都不会，是师傅一点点教，边干边学，后头做顺了，公司就信任我让我带项目。”

此外，公司在冲突协调上提供支持，缓解女性单独面对雇主的压力，使她们在服务性劳动中保持专业性与尊严。如“腊梅花”所述：“我遇到的客户都挺好，公司也会帮我们处理一些棘手问题。”

3.3 能动性：从家庭角色到职业主体的转化

尽管家政行业仍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与文化污名，但在“潜力女家政”平台，女性主体性在实际劳动中得以强化与重构。多数受访者表示，通过接受培训、取得职业认证并获得稳定收入，逐渐改变了家庭中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格局。

“沙沙妹”谈到：“现在我自己能挣钱，也会用电脑设计图纸，感觉有了用武之地。”其专业背景体现了新一代女性在家政领域的“职业化转向”。而“蝴蝶妹”等年长者则通过传授经验、组织社区活动，获得了新的尊重与社会角色。

此外，女性在组织平台上的集体身份重构亦值得关注。“五大姐”虽未纳入精准扶贫，却通过长期兼顾工作与家庭，被村委评为“好媳妇”。

“潜力女”通过制度支持、组织协作与社区网络三位一体的机制，使参与其中的女性实现了从“被扶持对象”到“能动劳动者”的身份跃迁，为乡村女性的再社会化与职业转型提供可行路径。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潜力女”企业为案例，运用参与式发展理论视角，分析农村女性在家政行业中的社区嵌入、协作机制与性别能动性。研究发现：

首先,社区嵌入为女性提供了稳定就业基础与社会支持资源。通过“近场就业”“家岗融合”“组织保障”等形式,女性不仅实现了从家庭到职场的空间转换,也通过社区型组织获得了制度性认同与安全感。

其次,协作机制强化了女性之间的集体互助与组织信任。“互助成长”“师徒带教”“资源共享”制度促进了员工的能力提升与职业认同,使个体不再孤立于市场关系之中,而是嵌入到一个互惠的组织网络之中。

第三,性别能动性在日常劳动中逐步生成。女性在工作过程中重构了自我价值、家庭地位与社会角色,不再是“临时替补劳动力”或“低端服务者”,而是具有专业能力、社会参与与文化表达能力的劳动主体。

4.2 理论与实践启示

(1) 参与式发展理论需重视性别视角与地方嵌入性。

本研究表明,真正的“参与”并非政策安排的工具性嵌套,而是通过具体组织结构与社区机制,激发女性的主动性与协作意愿^[4]。因此,应在参与式发展实践中加强对性别结构与家庭语境的分析^[13]。

(2) 地方组织在性别发展中的桥梁作用不容忽视。

以“潜力女家政”为代表的社区型女性就业平台,兼具社会服务、技能培训与情感支持功能,是实现农村女性发展与政策落地的关键支点^[14]。乡村治理应进一步加强与此类中介组织的协同共建。

(3) 脱贫后的“发展问题”需转向能力持续与社会融入。

从“建档立卡”到“稳定就业”,不能仅依赖一次性政策资源,更应关注妇女的后续成长性与社会参与空间^[15]。研究表明,通过组织协作与社区赋权机制,女性得以持续构建职业身份并扩大社会能动空间。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以“潜力女”平台为例,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与案例依赖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地域范围,比较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女性家政就业实践。此外,建议加强对用工单位(雇主)视角、家庭支持系统与政策实施效果的多元调查,以丰富对“协作与嵌入”机制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汪文正. 把家政服务嵌入社区[N/OL].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 11
[2] 南静静, 东波. 新时代社会工作助力我国农村女性

脱贫能力提升路径探析[J/OL]. 怀化学院学报, 2019, 38(7): 32 - 36

[3] 段塔丽, 李玉磊, 王蓉, 等. 精准扶贫视角下贫困地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能力脱贫实现路径探析——基于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J/OL].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6): 40 - 53

[4] 东坡, 刘同玉. 赋权增能: 后脱贫时代农村女性多维贫困干预路径选择[EB/OL] (2020)

[5] 关红. 依托民间艺术产业发展促进湘西地区农村女性就业、脱贫路径探索[J/OL]. 湖南包装, 2019, 34(5): 11 - 13, 36

[6] 袁晓燕, 施夏敏, 石磊. 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与流动女性就业[J/OL]. 学术月刊, 2023, 55(9): 58 - 67, 112

[7] 姜华, 顾立铭, 瞿正万, 林霞凤, 卢瑛, 蔡正宜, 孙喜蓉. 180 名下岗后从事家政服务女性身心症状及相关因素[J/OL].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3): 201 - 163

[8] 肖索未, 陈宗仕, 杨伊萌. 管理型中介: 家政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控制研究[J/OL]. 社会学研究, 2023, 38(4): 96 - 118, 228

[9] 李小云. 参与式发展概论理论方法工具[Z] (2001).

[10] 黄磊, 胡彬, 刘桂发. 参与式发展理论: 一个文献综述[J]. 大众科技, 2011, (11): 231-233.

[11] 王辉. 参与式发展理论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D]. 北京化工大学, 2019.

[12] Braun V, Clarke V. Thematic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M].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2022.

[13] 李勇. 跨国家政女工: 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的“共谋”[J/OL].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0(2): 101 - 111

[14] 苏熠慧. 性别结构下的“边界协商”: 家政女工的“生产—再生产”安排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24, (03): 39-50.

[15] 张慧瑜. 家政女工的四个“家”: 劳动、性别与文学书写[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4, (05): 45-51.

作者简介: 左丹(1983-), 女, 汉族, 河南商丘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BMZ137)阶段性成果。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2018SQN38)阶段性研究成果。